



钟家全:顽强制敌的英雄连指导员

□辛崇法

1945年7月7日,我滨海军区司令部发布命令,追认在日照县安东卫(今日照市岚山区)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滨海军区第二十三团一营二连指导员钟家全同志为战斗英雄。他在此次保卫战中,率领全连指战员战胜了7倍于我的日伪军,6次负伤不下火线,7次反冲锋出击,3次白刃格斗,打退了敌人16次进攻,最终以身殉国,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与7倍之敌白刃相见

钟家全系陕西人,1920年出生,初中文化。他自幼聪明好学,在读书期间就向往革命。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八路军,多次出色完成了战斗任务,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5月初,在我滨海军区发动夏季攻势的前三天,日军突然增兵山东,开始大“扫荡”。7日,驻安东卫之千余日伪倾巢出动,集中钢炮3门,迫击炮2门,重机枪4挺及所有火器向我二十三团(因团长覃士冕、政委王德贵习称“覃王”团)阵地疯狂出击。坚守李家庄南北一线的该团一营二连,在指导员钟家全等带领下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向7倍于我之敌进行英勇顽强的抗击。

战斗一开始,钟家全命令四班战士刘成文投炸弹。他从一条沟里爬上一块菜地,爬到离敌人十多米远的地方,突然把准备好的炸弹猛烈地投到敌人头上,身上,炸弹开了花,炸得鬼子也开了花。于是,他又迅速地爬回来,就这样连续几回,他投了40多颗炸弹,敌寇死伤20多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指导员钟家全不断地鼓动大家。当炊事员来送饭时,钟家全把挂包文件都叫他带回去,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钟家全又向三排阵地走去。三排阵地在二排右侧,那里是一片树林。打到下午两点,竹林几乎被敌人的重机枪子弹全部腰折,几排树木也被炮弹炸得只剩光秃秃的枝杈。一阵疯狂炮击后,几百个鬼子、伪军“呀呀”怪叫着冲上了三排阵地。三排活着的人端起刺刀与敌展开搏斗。敌人一层一层往上拥,渐渐地占领了整个阵地。

钟家全看到鬼子冲上了三排阵地,立刻推开给他包扎伤口的卫生员,对连预备队喊道:“五班、六班,跟我来!”五、六班闻声端着刺刀跳出工事,跟着指导员往三排阵地跑去。指导员边跑边对两个班长说:“你们各带半个班,从两侧包抄上去,其余的,跟我从中间冲。”看看接近三排阵地,



战斗英雄钟家全

各带人马分头行事。指导员挥着驳壳枪冲在前头,接连打倒两个敌人。

一个鬼子嗷嗷叫着,朝他冲过来。五班副班长张万新挺起刺刀迎上前去,一个防右刺,把鬼子的刺刀拨开,跟着一个直刺,把鬼子一枪刺倒。钟家全把驳壳枪往腰里一插,捡起鬼子的“三八”大盖,与另外一个鬼子对刺起来。张万新看指导员胳膊受了伤,怕他吃了亏,便靠着指导员和敌人拼刺。

钟家全将面前的鬼子刺倒后听到后面响动,赶紧回身。看到鬼子正从张万新后背上往外拔刺刀,他大叫一声:“杀!”将刺刀斜刺进鬼子的胸膛。

6次负伤不下火线

鬼子吃不住夹攻,倒退着往后撤。钟家全朝战士们大声喊道:“赶快扔手榴弹!”跟着飞过去一排手榴弹,把敌人炸得东倒西歪,抱头鼠窜。

敌人攻不动三排阵地,便集中炮火对二排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一百多个鬼子趁着烟雾冲了上来,占领了二、三排接合部的一所大瓦房。二排长李宝贵刚想喊射击,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哪里还有子弹呢,机枪射手的弹夹里,也只有5发子弹,急得眼珠子直冒火星子。

此时,钟指导员脚踏在一块碑基上,厉声喊道:“李宝贵!”

“有!”

“撤!”

“是!”李宝贵含着眼泪,深情地看着指导员,然后掉转身去,带着战士们朝南跑去。敌人呼喊着冲向坟地,指导员和连部的同志朝敌人射击。两个通信员接连被敌人打倒。指导员看看身后的二排已经跑远,便朝卫生员小张说:“咱们也撤!”

小张正和指导员交替掩护着往下撤,一颗子弹打过来,指导员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小张跑过来一看,指导员的腿脚负了重伤,连忙上去拉指导员。

指导员看到鬼子已到跟前,连忙对小张说:“你快走!”

小张不干,要扶指导员走。指导员只好下死命令:“小张你快走,我命令你!”小张看看指导员,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小张跑去不远,就听到背后枪声稀下来,连忙趴到一个沟坎里朝坟包上看。他看到两个鬼子已经冲到指导员跟前,指导员端起驳壳枪,“砰砰”两枪,把两个鬼子打倒在地。接着又掉转枪口,将最后一发子弹打进了自己的胸膛。

就这样,钟家全这位二连战士敬爱的指导员,为党、为革命、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这次保卫战中,二连指战员在指导员钟家全等率领下,在两夜一天的激战中,7次反冲锋出击,3次白刃格斗,打退了敌人16次进攻。

1945年7月7日,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渠、政治委员唐亮、副司令员万毅、政治部主任刘兴元等签署嘉奖令,命名二十三团一营二连为“安东卫连”,授予“顽强制敌”锦旗一面,并追授指导员钟家全同志为战斗英雄。

【民间记忆】

外调

□庞洪锋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外调,省内到过临沂、青岛、济南、章丘、胶东一带,省外去了山西、河北、河南等。外调,让我对生活有了一种在家体会不到的感受,也算一种财富吧!

外调最怕到村里去,因去村里往往交通不便,尤其那年代,村里通公路的极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一年,我和单位的老陆到河北,为发展一位同志入党,调查该同志的社会关系。她的外祖家在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

我们先去的县城,一进那个县城,第一印象就是这儿真穷。除政府大院外,整个县城连个像样的建筑物也没有,就是那条主街也窄窄的,脏脏的,两旁的房子大都风雨飘摇般的破烂不堪。我俩先到县组织部换了到该乡的介绍信,还要到该乡换信到要去的村。一打听,县里虽有长途车通乡里,一天就一趟,且已经过了发车时间,一问,县城离该乡大约50里路。要么住下,可时间就得拖长,要么走着去,人路两生,边走边打听路,当天就办不成事了。我俩当时一筹莫展。忽然,旁边有热心人提醒说县城有出租自行车的,就是贵点。

一句提醒梦中人,我本以为这里忒穷哪会有租自行车的呢。按热心人的指点,我俩找到出租自行车的地方。5块钱一天,贵啊,可当时也只好这样了。让他看过我们刚换到的县里证明信,当时还没身份证。车主犹豫一下说8块吧,我俩一愣,咋外地人就价高呢,旋即误会解除,车主是个善良人,他见我们是外省人又有县里证明信就特意优惠,两辆车10块他收8块,他还特意为我们选了两辆好车。并详细为我们介绍了要去的路,我们要交押金,他横竖不要,我们就出发了。

到了乡里,天已快黑了,我俩想乡里可能没人了吧,介绍信估计来不及换了。没想到,进了乡政府,一来说来,乡里派的人还在专门等着我们。那同志征求我俩意见,是先住下休息一下明天到村里,还是现在就去村里。我俩一对眼色道,先到村吧。也没换信,那同志就陪我俩到村里去了。找人、写材料、盖章等一应事都是乡里那位同志帮着张罗的,很快事情就办妥了。大队书记给我们煮的面条,虽然那面条是黑面做的,但我当时感觉比家里做的白面条好吃多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们那里招待客人的饭食,平时面里都掺粒的粗粮,不舍得吃净面的,那里的人真实诚厚道。回乡的路上,我忍不住问乡里的同志,乡里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他笑道,县上打来电话了,并说,多晚也得等我们。我心里一阵感动,那感动让我对这个社会一直心存好感。

这是顺利的,再说个有意思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是发展单位一同事入党。我的这位同事家在青岛,那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恰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眼都不够用啊。同去的老贾带了一套旧收音机,说是旧的,其实得有八成新。他告诉我,他要通过那位同事在青岛工作的弟弟买聚氯乙烷,这属国家控制的商品,市面上不好买,同事的弟弟答应给办,但需要一套扩音器材交换,旧的也行。我们到了青岛办完事后,去那同事家看望了她已退休的父母。饭后,老贾回我们住的旅店去了,我想找个书店看看,好像那是四方机车车辆厂路,正走着,突然,有只手把我的军帽抓下就跑,我一看,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浑身脏兮兮的,我想撵,但没有撵,随他去吧。当时青岛抢军帽成风,都是半大小子。回来后,我还给青岛教育局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他们还给我回了信。当年那个小孩如今也得五十多岁了,不知他能不能看到这篇文字。年轻人犯错,上帝都原谅,我也原谅你了。

我与梁启超家人的邻里往事

□刘树林

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

1940年,我出生在芙蓉街50号,全家租了房东张允恒家的四合院。站在院落后门南眺王府池子,北眺起凤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正是对这条老街的真实写照。直至建国后父亲到了省府工作,我家搬到了省府第四宿舍居住。在省直机关工作的梁思宁一家也住那里,我们两家关系甚好,我母亲又善于搞好邻里关系,两个孩子都比较多,经常在一起玩耍。听她家孩子说,小学历史课本上的那张光头像是他的姥爷,我们小孩子怎么也不相信,认为是瞎说开玩笑,课本上还能有你的姥爷!非要弄个明白不行,就去问了大人,果然是真的。梁思宁家有一保姆,除了看管孩子,还照顾她的婆婆直至去世,日常操持着全部家务,孩子们很听保姆的话,孩子们称呼她“娘娘”。

1959年我由济南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经常去西单手帕胡同33号看望梁启超夫人王桂荃。老人家思想进步,家里订有《人民日报》,每天看书看报,思维敏捷。她经常勉励我要学好专业技术,刚踏入社会一定要好好工作,多向老师傅学习;工作中要勤快,生活上要简朴,团结好同事,与人友善相处。对我讲的都是很实在的话。她家的保姆说王桂荃老人家掌握着家庭经济,许

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腿脚灵活,身体挺好,精神矍铄!还经常去附近的西单看戏看电影,家里还有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她让我去天津时看看她捐献给国家的房屋是否安好。

去她家的次数多了,就变得熟悉而亲切,交流也多起来。家里的墙上挂的大幅照片是其小儿子梁思礼,当时是“两杠四星”大校军衔,建国后由美国回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家人出出进进,都是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待人彬彬有礼,对当时二十出头的我热情打招呼,让我受宠若惊!每次去她家,老人家都要留我吃饭。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紧缺,油肉凭票供应,留下吃饭多不好意思!但老人家再三留我,她是四川人,还专门嘱咐保姆做菜不要放辣椒。她们是用“文明碗”,时值小伙的我,用惯了大碗,嫌碗太小,又不好意思一碗接一碗地吃。但老人家说小伙子饭量大,一定要吃饱!我留下的粮票老人家坚决不收。

每到回济南过春节之前,我都要去老人家家里取些东西捎给她女儿梁思宁。我回北京时再给老人家带点家乡特产,以表谢意。1963年,我回济南过春节,老人家捐给女儿一百元钱,另外给我十元带回家过春节,就这样连续四个春节直到1966年共资助了我四十元,相当于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1963年6月,正值我回济南休探亲假,恰巧老人家由北京到济南女儿梁思宁家,还到了住同院的我家

探视,并带来一些北京特产。这次济南之行,老人家还去游览了泰山,这也是她最后一次来济南。

1965年,梁思宁的丈夫章柯同志担任山东省科委领导,全家搬至经四纬六路省科委所在地,从此我们两家就分开了,但是两家人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我家人口多生活吃紧时,我弟弟就到梁思宁家借钱。梁思宁在借钱之外还会给两毛钱乘公交车的路费,但弟弟为省下两角钱总是徒步回家。当我家去还钱时,梁思宁说:“不用急!”章柯说:“不能要利息!”

次年,我父亲调至山东煤矿学院(现山东科技大学)工作,我家搬至科大家属宿舍。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上下批斗“当权派”,章柯、梁思宁夫妇也未能逃过一劫!他们家雇保姆也成为一大“罪状”,在这紧急关头,他们家保姆跑到我家避难。后来老保姆生病住院,梁思宁及其子女每天守护在病房,喂水喂饭,洗脸擦澡。保姆病故后,他们作为亲人料理后事,兑现了梁思宁将保姆养老送终的承诺。

1967年,“文革”正值高潮,我在北京去看望梁启超的夫人王桂荃,家里被抄,完全破败。老人躺在院落门房小黑屋里一块木板上,地上放一个热水瓶,凳子上放一个干巴烧饼,老人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你快走!红卫兵来了!”我含泪告别,目睹了老人家弥留之际的悲惨处境!次年老人离世,终年八十二岁。